

# 转型期中国企业资源分割的模型化分析

成功<sup>1</sup> 何晓斌<sup>2</sup>

(1.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是一项定性研究,主要是探讨为转型期中国建立一个企业资源分割的基础模型。政府资源对转型期中国企业的生死存亡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政府资源分割机制整合到原始资源分割模型中,利用产权归属差异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企业,并分析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与外资企业资源分割的过程。研究发现,只要中央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不受侵害,最充分利用资源的企业将会赢得最后胜利,而凭借在政府和市场中获取双重资源的企业,在企业资源分割过程中也将占据优势地位。

【关键词】转型中国 产权归属 政府资源 市场资源 资源分割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4)03-0049-04

## 引言

资源分割理论解释了当市场集中度提高时,综合性组织和专业化组织是如何对市场资源进行分割的。资源分割理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当市场集中程度增加时,综合性组织的死亡率上升而专业化组织的死亡率下降。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或理解中国转型期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在过去三十年里,在市场化改革环境下,中国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原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管制的企业如今纷纷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在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中国出现了各类产权企业,同时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遗留问题、市场机制的勃兴、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等因素,使得中国企业的资源分割过程更加复杂。

本文试图把当今中国企业的资源分割过程模式化,并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相应的预测。本文依据产权差异对企业进行划分,而不是相对模糊地把所有企业界定为综合性组织或专业化组织。具体而言,本文将描述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与外资企业的资源分割过程。由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当今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具有相似的企业行为,所以本文将两者一并讨论。

## 一、资源 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

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一书中,吉登斯将资源定义为“在社会交往的日常过程中变革性能力可以用来变成更大力量的媒介”<sup>[1]</sup>。据此,吉登斯将资源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权威型;一类为分配型。他将“权威型”定义为“可命令他人的能力”,将“分配型”定义为“对其他物体或者物质现象产生决定作用的能力”。

Sewell(1992)将这两种类型的资源进行了重新定义,他将资源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非人力资源可以用来增强或维护权力<sup>[2]</sup>。人力资源是一种体力、灵敏度、知识和情感承诺,它们可以用来增强或维护权力,包括有关获得、保留、控制、传播人力或非人力资源途径的知识。这两种资源都是权力的媒介且分布不均衡。然而,不管资源如何分配不均,所有类型的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皆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控。社会成员的力量是由他们所掌握的获取各种资源的渠道所决定的。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个行为领域:政治行政体系、社会关系和市场。这三个领域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与社会关系领域不会替代行政体系,而是跟其紧密相连。

据以上分析,在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资源: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这些资源在各自的领域中离散而不均匀分布

\* 本文为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编号 20110142120087)资助。

\* 作者简介:成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晓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着,但同时又是联系着的。政府资源是可用来维护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能力的事物,包括投资(资助)、信息、政府政策等。市场资源主要是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事物,主要包括:资金、原材料、员工、顾客、市场信息等。社会关系资源可以定义为与个体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这些人的财富、地位、权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

然而,由于社会关系资源总是跟市场联系在一起,在给定时间内它们很难量化。因此,本文在将企业资源分割的模型化过程中只考虑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

## 二、当今中国政府的资源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引进一些重要概念来分析政府资源分割的过程,然后分析影响资源分割过程的一些因素。

规模优势。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政府试图兴建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或工厂,从而为更多的工人提供工作岗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仍然掌控着这些大型企业。随着改革的开始,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的财政预算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但是它们同时也明显拥有规模优势。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就越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投资。

假设 1 政府投资额与企业规模大小成正比。

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政府努力加强和维护国有企业的首要地位。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资源都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尽管其中一些企业并未有效利用这些资源。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还有国有企业财务负担的加重,中央政府决定放弃一些经济效益不佳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而集中扶持那些规模大、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政策。这也意味着,政府很多税收将依赖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收入和盈利。

当政府的关注度跟企业规模成正比时,政府的资源空间才会由企业规模优势决定。企业的吸引力凭着其规模优势还有政府资源空间的增加而增加。因而,企业的生存能力也随着政府资源空间的扩大而扩大。

另外一方面,企业的生存能力凭着其规模优势还有政府资源空间的增加而增加。

虽然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改革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但居于大型企业之首的仍是国有企业,因为在毛泽东时期就开始了有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建设并持续至今。居于次位的是乡镇企业,因为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政府资源。由于不利的成长环境因素,许多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以小型

家族企业形式或是临时组织形式存在。

假设 2 :在转型期的中国,一般而言,国有企业拥有最大的企业规模,乡镇企业具有中等规模,私营企业的企业规模则是最小的。

政府资源中心。政府资源中心是一个满足以下条件的区域:(1)这一区域在基于明晰产权的投资分配上拥有一个峰值;(2)该区域的政府平均投资额要远远高于整个政府资源区域的平均投资额。当且仅当政府资源分布围绕  $\gamma$  这个峰值集中时, $\gamma$  这个位置才成为政府资源空间的中心。

正如很多党的文件和公告中所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因此,从政治角度上讲,国有企业理所应当成为政府资源的中心。通过某些合同或条约,它们可以优先获取国有银行的贷款,低于市场价的原材料,还有从大学和专业技术部门聘请专家能人。

政府资源分割。本文可以从政府资源空间中区分三类位置:(1)中央企业,即最具吸引力的企业;(2)邻近中央企业,即虽不最具吸引力但其基本领地与中心领地存在重叠;(3)边缘企业,即其基本领地与中央企业的领地没有重叠。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将政府资源进行如下清晰的定义:如果一个企业  $e$  的吸引力处于中心领域  $\gamma$ ,那么该企业处于政府资源中心。其次,当一个企业的吸引力掉出了中心领域但是其基本领地还跟中心区域  $\gamma$  有重叠,那么该企业位于接近政府资源中心。最后,如果一个企业的吸引力处于政府资源空间的边缘,且其基本领地与政府资源中心没有重叠,该企业则处于政府资源边缘。

根据以上定义,政府资源中心在资源分配上有一个峰值,因而政府资源中心可以给企业提供长大的机会。因此,那些最大吸引力依赖于政府资源中心的企业将最有利于抓住这些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假设:

假设 3 :位于政府资源中心的企业通常比位于政府资源中心附近的企业规模要大。

假设 4 :位于政府资源中心附近的企业比政府资源中心边缘的企业规模要大。

根据规模优势原理,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在具有资源中心的政府资源领域,位于资源中心的企业生存力最强,处于边缘地区的企业生存力最弱。

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为哪些客户服务,应该提供哪些产品等均由政府决定,

因此, 国有企业所有的基本领地皆由政府决定。甚至在改革之后的不完全市场环境下, 政府仍然控制支配着一些核心行业的基本领地, 比如石油、钢铁、电信、邮政、铁路、航空等, 这些行业很难受到来自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威胁。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后, 中央政府减少了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管制, 乡镇企业从中央政府获取的资助也随之减少。除了一些普遍优惠政策,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基本上不可能从中央政府获取直接资助。

假设 5: 在转型期的中国, 国有企业位于政府资源空间的中央位置, 乡镇企业位于临近中央的位置,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位于政府资源空间的边缘位置。

也就是说在转型期的中国, 国有企业在政府资源空间享有最高的生存机会, 乡镇企业次之, 私营与外资企业的生存力最低。

由于获取政府资源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过程, 因此, 拥挤(资源稀缺)不太可能发生在政府资源空间里。因为受到意识观念的影响, 政府总是会向国有企业倾斜。中央政府试图投资给这些最重要的企业, 这些企业可以尽量避免宏观调控的反复影响。

### 三、转型中国的市场资源

在本节中, 本文将讨论在控制政府这个维度的情况下资源分割过程是怎样在中国这样的不完全市场中进行的。

激励优势。就国有企业而言, “能力超载”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没有政策允许, 国有企业不得随意开除员工, 即使员工工作懈怠, 甚至渎职也不能开除。然而在市场资源空间中, 规模优势不一定继续有效。因此, 本文认为, 利益驱动此时成为国营企业、乡镇企业、私营和外资企业一决高下的关键因素。

在国有企业中, 企业经理人的决策行为对公司的影响是次要的。而且不论企业经理人的经营绩效好坏, 企业的大部分盈利都被中央政府拿走。由于棘轮效益, 即使是基于现在和过去绩效的激励合同也不能很好解决职业经理人的代理问题。而且由于政府对于管理过程的干涉, 国企的管理者可以将他们的过失归咎于政府决策不力。另外, 由国家直接监督经理人的管理行为因难以操作或因为监督费用高昂而令人却步(林毅夫等, 1998)<sup>[3]</sup>。

相比之下, 由于乡镇企业缺乏政府资源投入并享有增加的财政权力, 因此乡镇企业有更大的

激励来增加盈利。财政体制改革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权, 从而使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私营与外资企业作为独立的企业实体, 它们从政府争取资助十分困难, 因而它们具有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来开拓市场的最强大动力。事实上, 私营与外资企业试图利用丰富的社会关系来寻找合作伙伴, 采用更多的非正式合同, 并在政府关系上投入更多(周雪光等, 2003)<sup>[4]</sup>。

当且仅当企业的总体活动随着激励的增加而增加时, 市场就会以激励优势为特征。一个企业的吸引力随着其在以激励优势为特征的市场中的规模增加而增加。而一个企业的生存力随着其在以激励优势为特征的市场中的规模增加而增加。

假设 1: 在转型中国, 私营和外资企业具有最强的市场激励, 乡镇企业次之, 国有企业最小。

市场中心。市场中心地区的出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 该地区包含一个资源消费分布的峰值; (2) 该地区的平均资源消费开支大幅超出整个市场的平均水平。当且仅当市场中某一位置的资源分配(资源消费)有一个峰值  $\delta$ , 并且资源往该点集中时, 这个位置才成为该地区的市场中心。

细分市场。同样地, 根据企业在市场中的吸引力和基本领地的不同, 可以将市场中的企业分为三类: (1) 中心企业, 即吸引力峰值居于市场中心位置的企业; (2) 邻近中心企业, 即吸引力峰值不在市场中心位置但基本领地与中心市场存在交集的企业; (3) 边缘企业, 即吸引力峰值不在市场中心且基本领地与中心市场无关联的企业。

若一个企业  $e$  的吸引力在该市场的中心区域, 则该企业位于市场中心  $\delta$ 。若一个企业的吸引力峰值不在市场的中心区域但其基本领地与中心区域存在交集, 则企业位于近市场中心区域。若一个企业的吸引力峰值不在中心区域且基本领地与市场中心没有关联, 则企业位于市场边缘。

假设 2: 位于市场中心的企业的发展动力通常大于位于近市场中心的企业。

假设 3: 位于近市场中心的企业的发展动力通常大于位于市场边缘的企业。

根据激励优势原理, 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有市场中心的地方, 位于中心区域的企业生存率最高, 位于边缘区域的企业生存率最低。

假设 4: 在转型中国, 私营与外资企业位于市场中心区域; 乡镇企业位于近中心区域; 国有企业位于边缘区域。

由此可得,在转型中国,私营与外资企业市场生存力最高,乡镇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由于中央政府具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有效调控各种企业生存领地的重叠,因此,拥挤(资源稀缺)在不完全市场里并不一定会发生。

#### 四、转型中国资源分割的机制

基于以上对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两种资源的讨论情况,我们下面试图探寻中国企业总体资源分割机制。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转型中国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分别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与外资企业发展的影响作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在政府资源空间中,三类企业的所占优势由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与外资企业;然而在市场资源空间中,三类企业所占优势由高到低依次为私营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

然而,在转型中国,企业要得以生存并发展,必须抢占时机,充分利用所有的资源。

因而,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在当今中国,企业的整体生存能力取决于企业在政府资源空间和市场资源空间的整体适应程度。

假设 2:企业的整体生存能力随企业的可利用资源的增加而增加。

许多研究结果指出了转型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优势,如 Pieke(1995)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引发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模式,他称之为资本主义(capital socialism)<sup>[5]</sup>。在资本主义中,由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参与市场,而市场也反过来影响政府行政体系。

Oi(1992)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出现了很多商业集团的特征,政府官员扮演着集团董事会的角色。这种地方政府与企业整合的经营催生了一种被她称为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制度创新<sup>[6]</sup>。同样地,Nee(1992)也将这种由地方政府、市场、私营企业三者联盟而成的形式称为新地方主义(neolocalism)<sup>[7]</sup>。

另外,由于乡镇企业的大部分员工来自乡镇或农村,企业可以轻易把那些偷懒的员工从工厂里开除,因此,不存在像国有企业无法解雇懈怠员工而造成的严重的“能力超载”的情况。

假设 3:总体而言,乡镇企业在政府资源空间和市场资源空间中占据的资源份额最大。

因此,我们做出预测:1.在转型中国,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增强,乡镇企业的综合适应能力比国有企业要高。2.在转型中国,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增强,乡镇企业的综合适应能力比私营与外资企业要高。3.在转型中国,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增强,乡镇企业的死亡率要低于国有企业。4.在转型中国,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增强,乡镇企业的死亡率要低于私营与外资企业。

#### 五、讨论与小结

本文主要目的是为转型中国建立一个各类企业资源分割的基础模型。考虑到政府资源对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的生死存亡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政府资源分割机制整合到原始的资源分割模型中。本文采用产权归属的差异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企业,没有采用原始模型中综合性组织和专业化组织的二分法。在中国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经济转型环境下,无论是在政府资源空间或者是不完全市场环境下,由于中央政府的调节作用,企业基本领地的交叉重叠情况得到减弱,因此,资源拥挤状况不会发生。

本文认为,只要中央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和个体企业的利益不受侵害,最充分利用资源的企业将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最终,那些企业将凭借其在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中获取的双重资源将在企业资源分割中占据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 [1]Giddens,Anthony.1979.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Analys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Sewell,William H.1992.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Vol.98 No.1(July 1992):1-29.
- [3]林毅夫,蔡昉,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改革”[J].美国经济评论,1998(第88卷):422-427.
- [4]周雪光,赵伟,李强,蔡禾.“嵌入性与中国转型经济契约关系”[J].美国社会学评论,2003(第68卷):75-102.
- [5]Pieke, Frank N.1995.Bureaucracy, Friends and Money: The Growth of Capital Socialism in China [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ume 37 No.3:494-518
- [6]Oi, Jean C.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J].World Politics 45:99-126.
- [7]Nee, Victor.1992.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1-27.